

分工实践与观念互动的共塑:情境视角下的 中国夫妻婚姻满意度研究*

姜凤姝¹ 刘爱玉^{2,3}

(1. 2.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3. 北京大学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1)

关键词: 婚姻满意度; 性别分工实践; 性别观念互动; 夫妻互动情境

摘要: 围绕性别分工、性别观念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 现有文献欠缺夫妻双方的分析视角和互动情境的问题意识。本文使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 构建情境视角下的分析框架, 以考察经济和家务维度的性别分工实践以及夫妻性别观念互动如何共同形塑婚姻满意度。研究发现: 首先, “男人养家, 女人持家”的传统分工无法达成两性满意的婚姻, 当代中国女性要求丈夫既能挣钱养家也能分担家务, 男性虽然要求妻子操持家务, 但也看重妻子的经济贡献。其次, 基于夫妻双方性别观念的交织对观念互动进行分类, 性别观念冲突的类型不利于提升婚姻满意度, 个体对配偶经济贡献和家务贡献的重视程度随互动类型而变化, “丈夫现代—冲突型”中夫妻对彼此承担经济责任的要求存在矛盾, 表明分工实践与观念互动交互作用于婚姻感受。最后, 与性别分工实践相比, 夫妻间性别观念契合对中国夫妻婚姻满意度而言更为重要, 同时需要关注两种影响在不同婚姻队列和城乡地区间存在的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 C913.11

文献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4-2563(2024)06-0020-20

Division of Labor and Mutual Influences of Spousal Gender Attitudes: A Study of Marital Satisfaction from a Situational Perspective

JIANG Feng-shu¹ LIU Ai-yu^{2,3}

(1. 2.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3. The Center for Sociolog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of China,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Key Words: marital satisfaction; gendered division of labor; mutual influences of spousal gender attitudes; interactive situations

Abstract: There is a lack of attention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o interactive situations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dered division of labor, gender ideology,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Using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in 2020, this study develop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rom the situational perspective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s of gendered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pousal gender attitudes on marital satisfaction. It reveals that, firstly, the traditional model that “men as breadwinners, and women as

作者简介: 1. 姜凤姝(1995-), 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20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劳动社会学、家庭社会学。2. 3. 刘爱玉(1964-), 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 劳动社会学、性别与劳动。

*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不稳定工作与性别观念的重塑”(项目编号: 21BSH080)的阶段性成果。

homemakers” cannot meet the needs of a satisfying marriage.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require their husbands to both earn money and share housework. While men still expect their wives to do housework, they value their wives’ economic contributions. Secondl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pousal gender attitudes is noted and can be classified based on the degree by which the spousal attitudes converge and/or diverge. Couples with conflicting attitudes are not conducive to a satisfying marriage. The interaction of spousal gender attitudes, henceforth, affects differences in their views of each other’s economic and housework contributions. Also, when there is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spouses’ requirements for each other to bear economic responsibilities, both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mutual influences of spousal gender attitudes affect marital satisfaction even if the husband holds more equitable gender attitudes. Lastly, compared with the gendered division of labor,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spousal gender attitudes is more important for marital satisfaction. However, we find heterogeneity of effects across marital cohorts in urban versus rural areas.

一、问题缘起

2003-2020年中国的粗离婚率从1.05%持续攀升至3.09%,虽然2021年离婚冷静期实施后离婚率呈回落态势,但不足以说明婚姻关系趋于稳定^①。伴随婚姻意义的转变,个人幸福和情感缔结愈发成为人们的核心需求^①,婚姻满意度这一衡量个体对婚姻关系满意程度的主观感受^②事关人民幸福与社会和谐。在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中,经济和家务两个维度的性别分工实践以及对其公平性的认知是影响婚姻满意度的关键要素^{③④⑤}。围绕这个议题,中国多种社会、经济和文化转型交织,形成一幅传统与现代元素杂糅的马赛克图景^⑥,这能从以下发展趋势中窥见。

“男人养家,女人持家”的传统分工实践与现代幸福婚姻的适配性悄然生变。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性别差距逐渐缩小。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90后”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甚至超过男性0.39年^②;世界银行披露的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也位居世界前列。但私人领域的性别平等发展却处于“停滞”状态^⑦,女性在承担更多经济功能的同时,负担的家务远超过男性^⑧,这种不平衡的分工状况会激发女性对婚姻的不满^⑨。另一方面,伴随市场化的深入,两性的就业脆弱性均有增强趋势^⑩,虽然相比于男性,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更为弱势,可随着婚姻经济成本的攀升,经济基础对维持婚姻稳定来说愈发重要^⑪,不仅女性重视丈夫的经济贡献^⑫,男

性也会因妻子经济贡献不足而离婚意愿上升^⑬。

不过,性别分工实践对婚姻感受的影响取决于社会性别文化。具体而言,当女性持有现代性别观念时,她们的婚姻满意度在更大程度上受家务分工的影响^⑬。此外,性别观念本身在维系幸福婚姻中也发挥独立作用。当下中国呈现出一种综合了马克思主义性别平等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和儒家父权思想的马赛克性别意识形态^⑭。随着性别意识形态的日益多元化,个体越发重视婚姻双方精神世界的匹配,“三观相合”在年轻一代的结婚决策中被频繁提及^⑮,性别观念与家庭领域的性别分工实践密切相关,夫妻在这个“第四观”上的契合能显著提升女性婚姻满意度^⑯。

上述多重转型的相互叠加,表征着个体对配偶挣钱养家和分担家务的角色要求展现出传统与现代杂糅的特征,性别分工和性别观念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趋于复杂。哪些相关的个体、关系、行为和认知因素形塑了婚姻感受?学者们主要采取两种理论视角解答这一问题:一是基于经济理性假设的分工交换论,将个体视为独立并且更多受利益主导的资源交换者,强调配偶的经济贡献和家务贡献对婚姻感受的增益^⑰(pp.30-53);二是从价值观念出发的性别角色论,把个体看作性别规范体系支配下的文化行动者,关注个体的性别观念对婚姻感受的影响^⑱。

实际上,婚姻感受无法与夫妻互动情境割裂开来,我们需要讨论夫妻互动脉络中的经济分工实践、

①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年度数据,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②折算标准参照《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六号)——人口受教育情况》, https://www.stats.gov.cn/sj/tjgb/rkpcgb/qgrkpcgb/202302/t20230206_1902006.html。

家务分工实践、双方认知的性别规范及其相互作用等情境性要素。但是,既有文献大多是将男女视作相对独立的个体,欠缺夫妻双方的分析视角和互动情境的问题意识。比如,已有研究往往仅考虑作为研究对象的个体的性别观念,而没有考虑配偶的性别观念,更没有探讨丈夫与妻子在性别观念上的现代与传统程度,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类型的观念互动。伴随日趋多元化的性别意识形态,在夫妻之间不同现代程度的性别观念的交织中,性别观念互动呈现出多种样貌的契合与冲突状况,这构成了夫妻双方评价性别分工实践时的特定情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全面理解婚姻满意度这一扎根于具体而微的互动情境中的感受,应当同时关注夫妻双方的性别观念及其互动模式。

鉴于此,本文使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y, CFPS)数据,通过夫妻配对的研究设计,引入夫妻性别观念互动的类型学分析,构建情境视角的分析框架,来考察经济和家务两个维度的性别分工实践,以及夫妻性别观念互动如何共同形塑了个体的婚姻满意度。延展开来说,本文聚焦以下三组问题:第一,重点关注与“男人养家,女人持家”不同的现代角色要求,即丈夫分担家务对女性婚姻满意度的影响,以及妻子挣钱养家对男性婚姻满意度的影响;第二,中国夫妻的性别观念互动呈现哪些类型,哪种互动类型有助于提升婚姻满意度,夫妻对彼此经济贡献和家务贡献的重视程度是否在互动类型间存在差异;第三,对于男女两性的婚姻满意度而言,是配偶的经济贡献和家务贡献重要,还是夫妻间性别观念契合更加重要,分工实践与观念互动的影响在不同婚姻队列和城乡地区间是否存在异质性。

综上,在理论视域中,本文期望整合分工交换论和性别角色论,构建一个情境视角的分析框架,全面剖析新时代中国已婚男女的情感样态。目前学界更多关注真实的性别分工现状及其成因,较少涉及家庭成员对性别分工实践的评价与感知。本文通过探究性别分工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将相关的个体性、情境性、实践性和认知性因素共同纳入思考范畴,以期推进性别角色分工这一经典议题。在现实意义上,伴随中国婚姻家庭的变迁,传统与现代元素在同

一时空维度上并行交集、高度压缩^{[19](PP3-12)},本文使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可以检视当代亲密关系中与传统性别角色脚本不同的新变化。在“不婚不育”日渐成势的今天,厘清性别分工、性别观念与婚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对于探寻婚育率低迷的线索、构建和谐平等的婚姻关系、提振社会整体的婚育水平具有借鉴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在考察婚姻感受时,分工交换论认为丈夫与妻子所掌握的可供交换的经济能力与家务能力直接影响婚姻感受,性别角色论认为性别分工实践嵌入于性别规范体系中,可进一步控制和调节性别观念。但是,婚姻满意度既非纯粹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核算,也非全然源于文化规范对个体认知的直接映射,而是由夫妻互动所孕育的主观感受,涉及互动情境中的资源投入、个体认知和观念互动等多重要素。梳理已有文献发现,目前学者对于夫妻间性别观念互动的观照不足,对于从情境视角将分工交换论和性别角色论进行整合的研究更是鲜见。

因此,在构建情境视角的分析框架之前,本文先概括分工交换论和性别角色论的主要立场,并分析这两种理论视角在解释逻辑上的盲点,指出相关实证研究在数据时效性、变量操作化和研究设计等方面存在的缺陷,以便在理论与实证层面为婚姻家庭研究提供新的知识积累。

(一)分工交换论:经济贡献、家务贡献与婚姻满意度

分工交换论视婚姻收益为男女间基于性别分工的资源交换,婚姻满意度源于夫妻双方对彼此经济和家务贡献多寡的比较权衡。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家庭经济学将家庭看作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单位,强调男性经济资源和女性家务服务间的交换。缘于时间成本上的比较优势,丈夫需要扮演“养家者”角色,妻子则要专司“持家者”角色^{[17](PP30-53)}。

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和劳动参与率稳步提升,双薪家庭模式逐渐替代男性经济顶梁柱式的传统模式成为主流家庭模式^{[20][21]}。可是,公共领域的性别平等并不昭示着私人领域的齐头并进^[7]。女性结束职场中发条般

的运转后,还要完成家庭内的“第二轮班”^{[22](P15)},承担大部分家务劳动^{[8][23]}。这种不平衡的分工安排会侵蚀女性公平感^[9],激发夫妻间的冲突^[24],降低女性的婚姻满意度^{[3][5]}。分工交换论认为个体与能满足自身“收益”的配偶维持亲密关系,有研究证实中国女性的婚姻满意度明显低于男性^[25],工作与家务双重负担导致婚姻生活中女性的角色压力较大,出现更多心理健康问题^[26]。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丈夫的家务贡献越大,女性的婚姻满意度越高。

就丈夫婚姻感受而言,西方学者发现妻子经济贡献的影响是混杂且冲突的。“经济独立假说”认为,妻子参与劳动力市场会打破传统分工模式并影响婚姻收益,增加婚姻解体风险^{[17](PP54-79)[27]}。然而,“弹性假说”表明,妻子共担养家责任能提升丈夫婚姻满意度^[3],促进家庭福利和婚姻稳定^{[28][29]}。

但上述观点在中国的适用性尚不明确,国内研究较少讨论经济分工与丈夫婚姻感受的关系。基于 2014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三项实证研究显示,妻子经济收入对丈夫的婚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30][31]},妻子经济贡献过多反而会降低男性对家务分工的评价^[32]。可是,现有研究的数据无法捕捉中国社会近些年尤其是新冠疫情带来的生活风险骤然加大的背景下的快速转变。于是,本文使用更新的夫妻配对数据,探讨形塑婚姻体验的性别角色脚本是否出现新变化,并为检验西方学界的冲突观点提供来自中国的证据。

随着市场化改革向纵深推进,中国“大锅饭”式的福利供给制度逐渐转向个人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日益凸显家庭作为“安全网”的重要性^[33]。在两性就业脆弱性强化的背景下^[10],仅靠男性养家糊口难以应对经济风险,“男主外,女主内”可能不再是合理安排。一些本土研究揭示,男性在择偶时期寻找具备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女性,以共同承担家庭经济责任^[11]。此外,迫于生活成本压力,男性农民工会在养家角色上做出男性气质的妥协^{[34](PP90-91)}。与传统分工模式相比,双薪家庭更有利于改善经济状况,提高婚姻稳定性^[12]。因此提出假设 2。

假设 2:妻子的经济贡献越大,男性的婚姻满意

度越高。

分工交换论为婚姻感受提供了基于经济理性的解释,但该理论因忽视文化规范的作用而受到批评。婚姻满意度并非直接来自对经济贡献和家务贡献的量化比较,而是来自是否满足了个体的性别角色期待^[18]。对绝对意义上分工实践的平等进行简单观察,无法精准触及婚姻中的公平逻辑与情感体验,我们还需考虑关于男女两性的角色、地位和分工的认知,也即性别观念。因此,本文将进一步探讨性别角色论的核心观点。

(二) 性别角色论:性别观念与婚姻满意度

经济分工与家务分工是个体践行其性别角色认知的场域,不满意并非全然由客观的性别分工实践所激发,更多地是由分工实践与个体期待之间的偏离,或是由夫妻间性别观念冲突所导致。因此,性别角色论控制性别观念并考虑其调节作用,现存研究主要从个体认知和夫妻匹配两条路径来探讨性别观念的影响。第一条解释路径关注个体性别观念的现代程度。一方面,性别观念是发挥直接影响的独立要素,持有现代性别观念与男性更加积极的婚姻感受相关,却使女性更不满意婚姻现状^{[35][36][37]}。现代女性更可能与丈夫产生矛盾,但支持家务共担的男性反倒在与妻子的相处中获得好处^[38]。另一方面,性别观念也与性别分工交互作用于婚姻感受,相较于追求性别平等的女性,传统女性更能接受不平等的家务分工状况^{[4][5][13]}。第二条解释路径关注夫妻性别观念的契合状况。经验研究显示,当夫妻双方的性别观念契合时,他们在工作与家庭决策上更易达成一致,这有助于减少日常冲突^{[22](PP57-62)}。夫妻性别观念匹配显著提高了中国女性的婚姻满意度^[16],此外,夫妻共识还是提升中老年人婚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39]。反之,夫妻间价值观念的冲突会削弱婚姻稳定性,增加离婚风险^[40]。

(三) 情境视角下的婚姻满意度

1. 引入夫妻性别观念互动:基于类型学的分析

性别角色论为理解婚姻感受提供了一种文化视野,获得国内外诸多的实证支持。然而,该理论在解释逻辑和研究设计上仍存在疏失,现有文献更多是基于丈夫或者妻子的单一视角,忽视情境分析和互

动维度的重要性,导致对夫妻之间性别观念互动的研究较为缺乏。事实上,个体的经济和家务贡献只有符合夫妻双方的性别角色期待后才能转化为婚姻关系中有效的交换资源^[18],这表明性别分工的公平逻辑根植于特定的夫妻互动情境之中。

以研究微观互动为己任的符号互动论认为,“情境”(situation)是指人们在社会互动时所面对的情形或场景,包含作为行动主体的人,行动者间的角色关系,行动者的需求、资源、价值观念和行为等要素,日常生活中的行动只有在特定情境里才能传达其意义^{[41](PP1-12)[42](PP20-49)[43]}。秉承符号互动论的学术传统,本文的夫妻互动情境是指丈夫和妻子的双重互动主体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家务贡献、双方认知的性别规范及其相互作用等构成要素的集合。在夫妻互动的过程中,个体会对整个情境做出意义阐释与主观解释,这正是“情境定义”(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的核心理念,“情境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个体的行动和态度^{[44](PP1-2)[45]}。婚姻满意度的形塑同样源自个体对整体夫妻互动情境的感知与定义,涉及诸多情境性要素的直接和交互影响。

夫妻互动情境实际影响着婚姻感受,因此需要从夫妻双方的视角考察该情境中的构成要素。就性别观念对婚姻感受的影响而言,配偶性别观念正是互动舞台上的关键布景。少数考察了配偶观念的定量研究发现,丈夫的性别平等意识不仅能纾解家庭—工作冲突对妻子婚姻感受的负面影响^[46],还与妻子性别观念交互作用于双方对婚姻质量的评价^[47]。

但是,回顾性别角色论的两条解释路径后发现,在关注个体认知的路径中,现有研究通常只是考察了研究对象自身的性别观念,没有将配偶性别观念纳入考量,因而忽视了夫妻互动情境中“重要他人”的文化期待对互动过程的影响^{[41][35][37][38]}。在关注夫妻匹配的路径中,这些研究考虑了配偶性别观念,但在变量操作化方面仍有改进空间。既有研究要么在统计模型中同时纳入夫妻双方的性别观念^{[31][46][48]},要么将观念匹配处理成夫妻间性别观念得分的差值^{[16][39][40]},却没有关注由夫妻双方性别观念的相互交织构建的夫妻性别观念互动类型,从而难以考察婚姻内部多样化的观念互动模式,也就无法深入思

考婚姻感受扎根的具体情境。

中国人性别观念向现代的转变在不同性别、世代和城乡群体间具有不均衡性^[49],年轻世代中男性和女性的性别观念更是呈现“撕裂”现象^[50],有学者将当今社会的宏观性别意识形态描述为一幅斑斓交错的马赛克图景^[14],在微观家庭层面同样表现为夫妻之间传统与现代理念的杂糅互动。面对纷繁复杂的夫妻互动情境,我们需要描绘身处其中的夫妻在观念互动上展现出的多种样貌的协商一致和矛盾冲突,以便依据观念互动对具体情境进行细分,进而深入探究婚姻满意度这一情境性产物。

因此,本文基于丈夫性别观念现代程度和妻子性别观念现代程度两个维度,构建了夫妻性别观念互动的类型学框架(见图1)。性别观念现代程度体现了个体对于传统性别规范的内化程度,这里的传统与现代只是对趋向性的大致测量,并非认为性别观念能在传统与现代间做出截然区分。夫妻之间传统与现代观念的互动生成了不同的观念契合状况,互动中既存在协商成功从而达成一致的夫妻,也存在协商失败产生矛盾冲突的夫妻。具体而言,依据双维度的交织,观念互动呈现四种理想类型:既囊括第一象限中都支持性别平等和第三象限中都遵循传统性别规范的夫妻,也包含第二、四象限中性别观念冲突的夫妻。

2. 分工实践与观念互动的共塑:一个分析框架

综上所述,目前围绕性别分工、性别观念对婚姻满意度影响的实证研究主要存在三点疏失。

第一,资源交换与文化认同并非二元对立,经济逻辑和文化逻辑共同形塑了个体婚姻体验,因此应当搭建起整合分工交换论和性别角色论的分析框架。然而,鲜有研究将夫妻双方的经济贡献、家务贡献和性别观念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中,同时考察男女两性的婚姻感受,并关注婚姻关系中与传统性别角色脚本相悖的新变化。

第二,既有研究缺乏对情境分析和互动维度的观照,性别角色论的相关研究往往只停留于个体观念现代性和夫妻观念契合度,没有探讨夫妻性别观念互动的多种类型,也未揭示不同类型间分工实践对婚姻感受的差异化影响,因此仅由夫妻一方观念所得到的结果难免有失偏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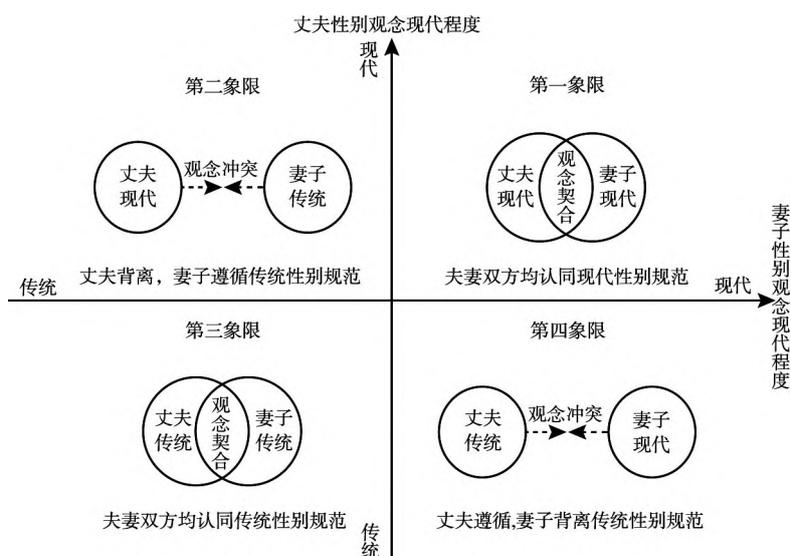


图1 夫妻性别观念互动的类型学框架

第三,对分工实践和观念互动的关注基于不同的理论预设和解释逻辑,两种解释的适用性会随时间和空间而发生变化。但是,现有研究忽视了分工实践和观念互动的作用力大小比较,也没有充分考虑两种影响在不同婚姻队列和城乡地区之间的异质性,从而未能很好地解答经济逻辑与文化逻辑在形塑中国夫妻的婚姻满意度时孰强孰弱。

借助夫妻性别观念互动这一分析工具,本文将性别角色论拓展为观念互动论,并通过夫妻互动情境将分工实践和观念互动整合进同一理论框架内进行勾连分析。假设1和假设2关注性别分工实践的直接作用。此外,本文还考察夫妻观念互动的直接作用、分工实践与观念互动的交互作用,以及分工实践与观念互动在不同婚姻队列和城乡地区之间的差异化影响。

首先,人们倾向于选择与自身价值观念相似的配偶^[51]。夫妻间的文化相似性有助于建立持久的情感连接,达成和谐稳定的婚姻关系^[52]。依据性别角色论中关于夫妻匹配的研究,性别观念契合的夫妻在工作与家庭决策上更不易产生分歧。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以关注观念互动的直接作用。

假设3:夫妻性别观念互动的类型显著影响双方婚姻满意度,具体来说,观念契合提高婚姻满意度,观念冲突降低婚姻满意度。

其次,婚姻满意度是掺杂着资源交换和文化认同的情境性感受,满意感并非只受到分工实践和观念互动的直接影响,还受到分工实践和观念互动的交互影响。性别观念互动构成了夫妻双方在评价彼此经济贡献和家务贡献时的具体情境,由此分工实践和观念互动相互作用于婚姻满意度。当夫妻的性别观念不一致时,夫妻对彼此经济贡献和家务贡献的重视程度也可能存在不同,这意味着个体在家庭中的贡献没有获得配偶的赞赏^{[22](pp242-245)}。比如,有学者指出典型的错配组合是“追求平等的妻子与遵循传统的丈夫”,妻子期待与丈夫共同料理家务,丈夫却提倡传统的家务分工模式,导致“谁来持家”成为婚姻矛盾的主要焦点^[53]。而当妻子期待丈夫履行养家者的角色、丈夫同样期待妻子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时,既有研究却没有解答婚姻矛盾是否会集中显现为“谁来养家”。本文希望全面考察分工实践与观念互动的交互作用,因此提出假设4。

假设4:在夫妻性别观念互动的不同类型间,配偶的经济贡献和家务贡献对个体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强度存在显著差异,其中观念冲突的夫妻对彼此挣钱和做家务的重视程度存在矛盾。

最后,安德鲁·切尔林(Andrew Cherlin)富有洞见地指出,在西方社会,婚姻意义经历了从制度婚姻中恪守传统规范,到伴侣婚姻中遵从性别角色,再到

个体婚姻中强调情感等非物质需求的转变^[1]。国内研究也发现,与客观经济地位相比,夫妻观念匹配对女性婚姻满意度的作用更为关键^[16],一种追求共同语言、互相尊重的夫妻关系已然出现^{[54](PP111-115)}。

不过,我们将婚姻感受置于夫妻的互动情境(interactive situation)中理解,同样要考虑由时间和空间界定的社会情境(social context)。观念契合为重的论断并不适用于所有群体,作为时间和空间维度的指示物,不同婚姻队列和城乡地区的群体面临的现代化发展水平迥异。现有研究表明,在时间维度上,年轻世代相较于年长世代更为注重精神和情感需求^{[52][55]},且年轻女性的婚姻感受更多地受家务分工的影响^[47];在空间维度上,与农村居民相比,传

统分工模式对城镇居民的婚姻稳定性的损害更大^{[5][12]}。本文预期分工实践和观念互动的影响在不同的婚姻队列和城乡地区间有所不同,因此提出假设5。

假设5:与配偶的经济贡献和家务贡献相比,观念互动类型对个体婚姻满意度的影响更大,但这种主导作用在不同的婚姻队列和城乡地区间存在异质性。

综上,本文围绕夫妻互动情境中丈夫和妻子的双重互动主体,把握“个体—配偶”“实践—认知”“传统—现代”三对关系,旨在探讨分工实践与观念互动如何共同形塑中国夫妻的婚姻满意度。本文分析框架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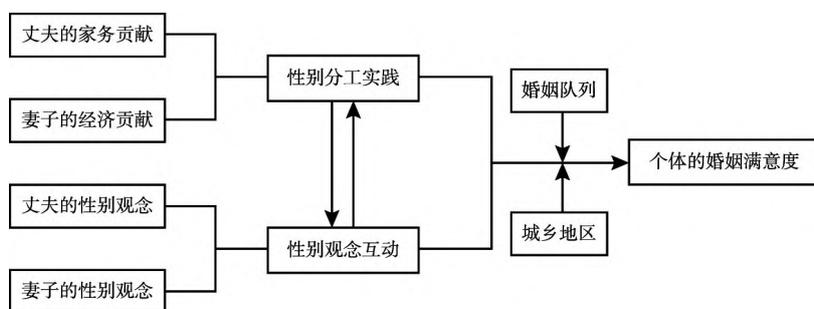


图2 情境视角下婚姻满意度的分析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是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持的全国性社会追踪调查,该调查于2010年正式启动,采用三阶段内隐分层的概率抽样法,在25个省/市/自治区抽取近16000户家庭,以样本家庭中的全部家庭成员为调查对象。此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对初访样本展开了每两年一次的追踪调查。

为确保数据的时效性,本文使用最新一轮询问了受访者婚姻满意度和性别观念的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在分析过程中,我们依据家庭关系库中的配偶信息将夫妻匹配起来,成功匹配的夫妻样本共计6729对。在采用案例删除法(casewise deletion)处理缺失值后,最终进入模型分析的样本量为6052对。

(二) 变量测量

1.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婚姻满意度。问卷中的婚姻满意度量表包含3个题项,分别是“总的来说,您对您当前这段婚姻生活有多满意”“您对对方在经济上为家庭做出的贡献有多满意”以及“您对对方在家务上为家庭做出的贡献有多满意”。受访者依据对这三方面的评价打分,得分从代表“非常不满意”的1分,到代表“非常满意”的5分。三项指标的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alpha)为0.754,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出一个公因子,将之处理为取值为0-100的婚姻满意度得分,分值越高表示受访者对婚姻关系的满意度越高。

2. 自变量

分析的自变量之一是由配偶经济贡献和家务贡献所测量的性别分工实践。本文采用绝对收入和相

对收入来测量经济贡献。绝对收入包括个体的受雇劳动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和退休金收入(适用于已退休人员)。针对相对收入,本文采取被学界广泛使用的经济依赖测算法^[56],计算公式为(本人收入-配偶收入)/(本人收入+配偶收入),其值域为[-1,+1],其中-1表示本人在经济上完全依赖配偶提供支持,+1表示本人向配偶提供完全的经济支持,0表示双方彼此在经济上没有依赖。此外,为了更好地刻画夫妻经济依赖状况,本文还计算了本人是否全部或基本依靠配偶收入。所谓全部或基本依靠,是指本人收入在夫妻收入总和中所占比例不超过20%。

本文同样采用绝对值和相对值来测量家务贡献:一是受访者在工作日和休息日中投入家务劳动的时间,不包括照顾家人的时间,本文先赋予工作日权重5/7,赋予休息日权重2/7,随后加总得到平均每日家务劳动小时数;二是本人家务劳动时间占夫妻总和的百分比。

另一个自变量是夫妻性别观念互动。调查问卷测量性别观念的题目包括“男人以事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女人应该有孩子才算完整”和“男人应承担一半家务”。被访者按照从1到5的分数对上述陈述进行认可评价,1分

代表“非常不同意”,5分代表“非常同意”。本文对除“男人应承担一半家务”之外的三项陈述均采用逆向编码,得分越高表明个体持有的性别观念越现代。

相关性分析显示,在0.001的统计水平上,样本中“男人家务”与其余三项指标间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这是因为只有4.63%的妻子和5.77%的丈夫明确反对“男人应承担一半家务”,导致该指标的集中程度远高于其他题目。鉴于数据分布特征,为了避免解释困难和理解偏差,本文参照以往研究的做法^[57],基于“男女分工”、“女人婚姻”和“女人子女”三项指标进行聚类分析,以探索夫妻性别观念互动的分类^③。

3. 控制变量

本文包含个体和家庭两个层次的控制变量:一是夫妻双方各自的特征,包括受教育年限(年)、是否为共产党员、职业类型、是否为非农业或居民户口、是否为汉族、自评身体是否健康;二是夫妻双方共同的特征,包括夫妻受教育程度差距、夫妻年龄差距、婚龄(年)、未成年子女数量、是否与夫妻一方的父母同住、夫妻双方父母中是否有75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夫妻是否同住、家庭是否居住在城镇、居住地所在地区。表1展示了分析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6052)

变量	统计值				变量	统计值	
	妻子		丈夫				
婚姻满意度	79.40	(21.12)	89.30	(16.04)	夫妻受教育程度差(%)		
家务时间	2.83	(2.04)	1.74	(2.01)	妻子受教育程度低于丈夫	39.92	
家务时间占比	0.65	(0.25)	0.35	(0.25)	妻子受教育程度与丈夫一样	41.90	
收入对数	6.56	(4.51)	8.59	(3.74)	妻子受教育程度高于丈夫	18.18	
经济依赖	-0.31	(0.56)	0.31	(0.56)	夫妻年龄差(%)		
基本依靠配偶收入	0.35	(0.48)	0.08	(0.27)	丈夫比妻子小3岁及以上	4.28	
男女分工观念	2.39	(1.31)	2.20	(1.19)	夫妻年龄差在3岁以内	63.33	
女人婚姻观念	2.48	(1.32)	2.52	(1.31)	丈夫比妻子大3岁及以上	32.39	
					婚龄(年)	25.09	(14.27)

③依据夫妻双方在性别观念上的回答,如果将回答“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者界定为传统,其余的归为非传统,由此可以人为划分出四种类型,即“丈夫传统,妻子传统”“丈夫传统,妻子非传统”“丈夫非传统,妻子传统”“丈夫非传统,妻子非传统”。本文直接划分夫妻在男女分工观念上的类型,并将其作为聚类分析结果的替换测量,发现人为分类与聚类分析后的主要分析结果是一致的,说明研究结论稳健。与基于单一指标的人为分类相比,本文使用基于多项指标的聚类分析,以更全面地捕捉个体对性别角色的认知。

续表

变量	统计值				变量	统计值	
	妻子		丈夫				
女人子女观念	1.91	(1.15)	1.99	(1.19)	夫妻受教育程度差(%)		
受教育年限(年)	7.37	(5.10)	8.81	(4.34)	未成年子女数(%)		
党员	0.06	(0.23)	0.16	(0.37)	0个	57.65	
职业(%)					1个	21.48	
管理职业	3.22		6.10		2个及以上	20.87	
专业职业	6.49		5.70		与父母同住	0.28	(0.45)
一般非体力职业	17.22		13.88		父母中有高龄老人	0.36	(0.48)
工农职业	42.83		58.51		夫妻同住	0.95	(0.21)
其他	1.92		2.20		居住城镇	0.51	(0.50)
不在业	28.32		13.62		居住地区(%)		
非农业/居民户口	0.27	(0.44)	0.29	(0.45)	东部	31.05	
汉族	0.93	(0.26)	0.93	(0.25)	中部	25.93	
自评健康	0.72	(0.45)	0.78	(0.41)	西部	29.46	
					东北	13.57	

注:括号中为连续变量的标准差。

(三) 分析策略

本文的数据分析包含四部分。首先,本文对性别观念得分进行标准化处理,使用 K-means 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划分夫妻性别观念互动的类型。聚类分析根据夫妻双方的性别观念得分将其分成若干类,使得同一类型内的同质性尽可能高,以揭示观念互动的典型模式^{[58](PP114-135)}。其次,由于因变量为连续变量,本文运用常规最小二乘法(OLS)回归模型来分析分工实践与观念互动的直接影响。再次,本文在回归模型中纳入夫妻性别观念互动与配偶经济贡献、家务贡献的交互项,以探讨分工实践与观念互动的交互影响。最后,本文从婚姻队列和城乡地区两方面来划分全样本,通过分组回归的方式考察分工实践与观念互动在不同群

体中的作用力大小,并使用似无相关方法(seemingly unrelated estimation)对模型中回归系数的组间差异进行检验^[59]。

四、研究发现

(一) 夫妻性别观念互动的四种典型类型

为了归纳出中国夫妻性别观念互动的典型类型,本文基于夫妻双方对三项性别观念陈述的态度,预先设定好不同的类型数目,以展开 K-means 聚类分析。综合考虑各类型的现实解释力、后续的分析便利性以及前文构建的类型学框架后,本文最终选取了四分类模型。表 2 呈现了四分类在各项性别观念标准化得分上的均值,大于 0 表明性别观念相对于样本平均水平偏向现代,小于 0 表明与样本平均水平相比性别观念更为传统。

表 2 夫妻性别观念互动的聚类分析(N=6052)

变量	夫妻传统—契合型	妻子现代—冲突型	丈夫现代—冲突型	夫妻现代—契合型
妻子性别观念				
男女分工	-0.68	0.71	-0.45	0.94
女人婚姻	-0.67	0.69	-0.43	0.94
女人子女	-0.56	0.47	-0.47	1.12
丈夫性别观念				
男女分工	-0.72	-0.20	0.43	0.98

续表

变量	夫妻传统—契合型	妻子现代—冲突型	丈夫现代—冲突型	夫妻现代—契合型
女人婚姻	-0.75	-0.35	0.71	0.86
女人子女	-0.63	-0.43	0.53	1.03
百分比(%)	31.86	25.51	26.50	16.13

依据四个类型在各指标上的呈现情况,我们将四种类型分别命名为“夫妻传统—契合型”(31.86%)、“妻子现代—冲突型”(25.51%)、“丈夫现代—冲突型”(26.50%)和“夫妻现代—契合型”(16.13%)。聚类分析的结果验证了由夫妻双方性别观念的相互交织所建立的类型学框架,勾勒出当代中国夫妻间观念互动模式的全景图。对于夫妻性别观念互动的四种类型分别具有哪些特征,本文结合不同类型在婚姻满意度和性别分工实践上的差异(见图3)^④,对此予以解答。

第一类夫妻在三项性别观念上得分均最低,表明夫妻双方共同遵循传统性别规范,可以被界定为

“夫妻传统—契合型”。该类型最大的特点是夫妻对婚姻生活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其余三类,丈夫和妻子的婚姻满意度分别为90.85分和83.04分,同时双方花费在家务上的时间最多,各自的年收入也都相对更低。但若从夫妻差异来看,此类夫妻的性别分工状况并非最为传统。

第二类的妻子持有现代性别观念,而丈夫却信奉保守性别规范,故归纳为“妻子现代—冲突型”。在这类得到较多学界关注的错配夫妻中^{[22](PP242-245)[53]},妻子的婚姻满意度仅为74.68分,明显低于其他类型,丈夫的满意度得分也相对较低(88.44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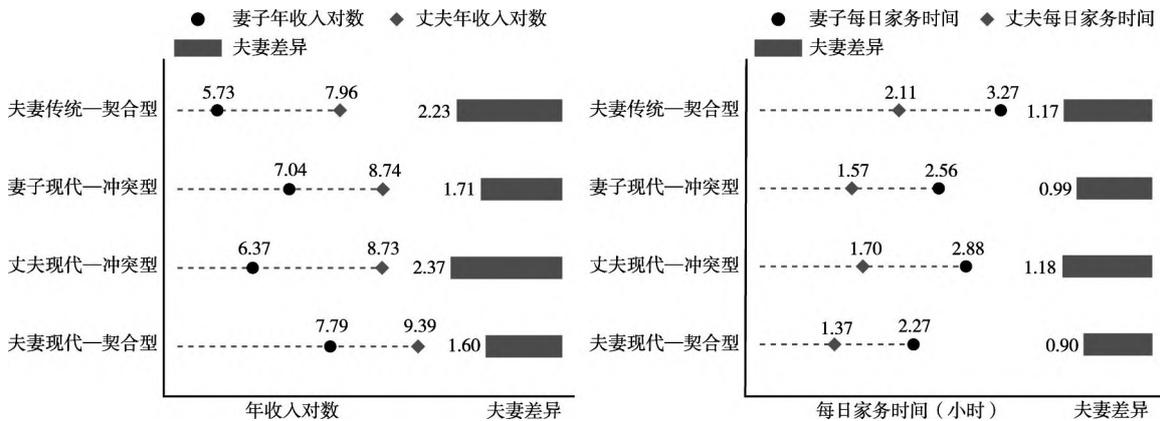


图3 四种观念互动类型的性别分工实践

第三类的妻子遵循传统性别规范,但丈夫持有现代性别观念,因此命名为“丈夫现代—冲突型”。该类型的丈夫对婚姻生活最为不满,满意度得分仅为88.28分,而妻子的满意度得分相对较高(81.09分)。此外,该类夫妻在家务时间和个人收入上的性别差异最大,表明这类夫妻的分工实践最为偏向“男主外,女主内”模式。

第四类夫妻共享着现代性别观念,双方在所有性别观念指标上得分均最高,因而被称为“夫妻现代—契合型”。该类夫妻在性别分工上展现出较为现代的格局,丈夫的婚姻满意度为89.29分,然而妻子的婚姻评价并未更积极,76.90分的满意度得分仅高于“妻子现代—冲突型”。

上述四种类型描绘了孕育婚姻感受的典型情

^④方差分析显示,在0.001的显著度上,婚姻满意度、每日家务时间和年收入对数在四种类型间存在显著差异。

境,刻画了夫妻间在传统与现代性别角色认知上的杂糅互动,反映了婚姻内部多样态的契合与冲突。具体而言,达成共识的夫妻占比为47.99%,其中认同传统规范的夫妻比例超过了共享现代观念的夫妻。余下两类夫妻则表现出观念互动中的矛盾碰撞,两类冲突型夫妻的比例相近,共计达52.01%。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回归模型来考察分工实践与观念互动对婚姻满意度的直接影响。

(二) 分工实践、观念互动与婚姻满意度

表3和表4分别为妻子和丈夫的婚姻满意度多元回归结果,所有模型均纳入全部的控制变量^⑤。区别在于各模型的自变量测量不同,主要是为了全面刻画夫妻的性别分工实践,并检验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模型1采用绝对的收入和家务时间,模型2采用配偶是否依靠本人收入和相对家务时间,模型3采用经济依赖和相对家务时间。由于相对值更能体现公私领域劳动的分配属性,因此本文基于模型3,在模型4中进一步加入夫妻观念互动变量。本文发现,无论采用何种测量方法,分工实践与观念互动都稳定影响着两性的婚姻满意度。

1. “男人养家,女人持家”无法达成两性满意的婚姻

就配偶经济贡献的影响而言,女性仍旧看重丈夫的经济贡献,丈夫基本依靠自身供养家庭会导致女性的满意度降低5.37分。然而,男性同样重视妻子的经济能力,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妻子的收

入对数($b=0.12, p<0.05$)和提供的经济支持($b=1.21, p<0.01$)对丈夫婚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妻子收入在夫妻总收入中的占比低于20%时,男性满意度会下降约0.81分。

本文的分析结果验证了西方学界的“弹性假说”^{[31][28][29]},但与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30][31]}。我们发现,妻子挣钱养家有助于丈夫获得更为积极的婚姻感受,说明近几年来丈夫养家模式无力应对急剧上升的再生产成本,妻子的经济贡献对稳定家庭生计、实现满意婚姻至关重要。

在配偶家务贡献的影响上,男性依然重视妻子的家务贡献,随着妻子的家务占比提高,丈夫对婚姻关系的满意度也在提升($b=2.15, p<0.05$),而妻子实际家务时间的系数并不显著(见表4的模型1)。与此同时,丈夫分担家务有助于提高妻子的婚姻满意度,不论是丈夫在家务上投入更多时间($b=0.24, p<0.1$),还是提高家务时间占比($b=3.98, p<0.001$),妻子都会更加感到满意。这些结果显示,相较于男性,女性对家务分工实践格外敏感,在经济贡献之外,她们还要求丈夫共担家务。

上述发现支持了假设1和假设2。无论是对于丈夫还是妻子,不均衡的养家责任和家务负担都会给婚姻关系带来消极影响。传统的“男人养家,女人持家”分工模式无法达成两性满意的婚姻,妻子挣钱养家促使男性对婚姻更满意,丈夫分担家务促使女性对婚姻更满意。

表3 妻子婚姻满意度的多元回归结果(N=6052)

自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配偶收入对数	0.324*** (0.083)			
配偶家务时间	0.236+ (0.143)			
配偶经济依赖			2.758*** (0.592)	2.672*** (0.588)
配偶家务时间占比		3.732** (1.159)	3.977*** (1.166)	3.926*** (1.157)

⑤限于篇幅,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留存备索。

续表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配偶基本依靠本人收入		-5.368 *** (1.144)		
本人收入对数	-0.089 (0.070)	0.047 (0.068)	0.158 * (0.077)	0.164 * (0.077)
本人家务时间	-0.190 (0.133)	0.018 (0.141)	0.029 (0.141)	-0.033 (0.140)
夫妻性别观念互动 (夫妻传统—契合型=0)				
妻子现代—冲突型				-6.556 *** (0.766)
丈夫现代—冲突型				-1.105 (0.684)
夫妻现代—契合型				-4.064 *** (0.93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75.740 *** (2.933)	76.357 *** (2.934)	74.402 *** (2.962)	76.898 *** (2.986)
R ²	0.066	0.068	0.068	0.081

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表示 $p < 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

表 4 丈夫婚姻满意度的多元回归结果(N=6052)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配偶收入对数	0.122 * (0.050)			
配偶家务时间	0.043 (0.104)			
配偶经济依赖			1.210 ** (0.444)	1.224 ** (0.445)
配偶家务时间占比		1.931 + (1.090)	2.145 * (1.092)	2.075 + (1.096)
配偶基本依靠本人收入		-0.810 + (0.465)		
本人收入对数	0.023 (0.061)	0.097 (0.063)	0.168 * (0.071)	0.174 * (0.071)
本人家务时间	0.032 (0.107)	0.195 (0.133)	0.210 (0.133)	0.186 (0.133)
夫妻性别观念互动 (夫妻传统—契合型=0)				
妻子现代—冲突型				-1.778 ** (0.586)

续表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丈夫现代—冲突型				-2.211*** (0.559)
夫妻现代—契合型				-0.496 (0.70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86.699*** (2.319)	85.653*** (2.433)	85.145*** (2.437)	86.077*** (2.444)
R ²	0.023	0.023	0.024	0.027

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表示 $p < 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

2. 性别观念冲突的夫妻类型不利于提升婚姻满意度

表3和表4的模型4显示,与“夫妻传统—契合型”相比,性别观念冲突的类型会显著降低夫妻双方的婚姻满意度,这验证了现有研究的发现^{[16][40]}。但是基于类型学的分析,我们可以细致地考察四种观念互动类型在婚姻感受上的具体差异。哪种观念互动类型中男女两性对婚姻关系不满程度最高?本文发现,当本人背离而配偶遵循传统性别规范时,男女两性的婚姻满意度最低。与参照组相比,“丈夫现代—冲突型”中丈夫的婚姻满意度显著降低2.21分,“妻子现代—冲突型”中妻子的婚姻满意度显著降低6.56分。换言之,当夫妻的性别观念存在冲突时,追求性别平等的一方会有更加消极的情感体验。

从契合型的观念互动来看,相较于“夫妻传统—契合型”,在都持有现代性别观念的夫妻中,丈夫的婚姻满意度不存在显著差异,妻子的婚姻满意度却明显降低了4.06分。可能的解释是,按照既定的传统性别角色来运作婚姻可能比打造新模式更容易,因为传统家庭中需要协商的议题较少^[48]。相比之下,当家庭内部缺乏明确的角色期待时,夫妻双方关于性别分工实践的协商可能会增加。至此,假设3部分被证实。

在控制变量上,党员身份、身体健康、居住于东北地区 and 婚姻持续时间长均会提升两性的婚姻满意度。从家庭结构、抚幼和养老负担来看,只有妻子的

婚姻满意度会受到显著影响,当家庭中有75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或未成年子女需要照料时,女性容易对婚姻关系感到不满,而男性的婚姻评价却不受“一老一小”照料需求影响。

(三) 分工实践与观念互动的交互作用

本文在表3和表4中模型4的基础上纳入了夫妻性别观念互动与配偶经济依赖、配偶家务时间占比和本人收入对数的交互项,图4和图5直观展示了交互效应。分工实践对婚姻感受的影响无法从由观念互动构成的特定夫妻互动情境中脱嵌,由此假设4的前半部分得到数据支持。下面分别阐述男女样本中分工实践与观念互动的交互作用。

1. 女性对丈夫经济和家务贡献的重视程度随互动类型而变化

从丈夫经济贡献的影响来看,只有“丈夫现代—冲突型”的交互项显著($b = 2.54, p < 0.1$),余下两类观念互动的交互项并不显著。有学者指出,中国女性对丈夫经济贡献的重视程度不随自身性别观念的变化而变化^[5]。但本文表明,当丈夫不认同男人养家规范而妻子崇尚传统分工模式时,妻子更为重视丈夫履行养家责任,她们的婚姻评价更可能因丈夫经济贡献不足而降低。这说明夫妻互动情境是剖析婚姻感受的有力视角,它揭示了在仅考虑单方认知时被掩藏的信息。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女性本人收入的影响也在互动类型间存在显著差异。与“夫妻传统—契合型”相比,无论是传统女性还是现代女性,只要其丈

夫不遵循传统性别规范,经济自主性都会更大幅度地提升女性的满意度,且这种积极影响在一致持有现代观念的夫妻中最大($b = 0.64, p < 0.01$)。这一发现表明,丈夫持有现代性别观念有助于妻子突破持家者角色的桎梏,她们因为丈夫尊重其发展事业而获得较高的婚姻满意度。这也呼应了现有文献的发现,即传统丈夫的妻子在发展事业时,可能会面临亲密关系受损的风险^[53]。

从丈夫家务贡献的影响来看,家务均摊对“夫妻传统—契合型”中妻子婚姻满意度的提升作用较弱,图4中其预测线斜率最小,表明这类女性不会因承

担较多家务而表达强烈不满。但相较于参照组,“丈夫现代—冲突型”中的妻子却更为重视丈夫做家务($b = 5.54, p < 0.05$),而剩下两类的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如果以对配偶家务贡献的满意度为因变量,结果则显示,随着丈夫做家务增多,“妻子现代—冲突型”($b = 8.77, p < 0.05$)和“夫妻现代—契合型”($b = 9.39, p < 0.1$)中的妻子都会表现出更高的家务贡献满意度^⑥。上述结果表明,一方面,现代女性追求性别平等,她们尤其要求夫妻间家务共担;另一方面,即使女性遵循传统规范,一位拥护性别平等的丈夫同样会强化她们对家务分配公平性的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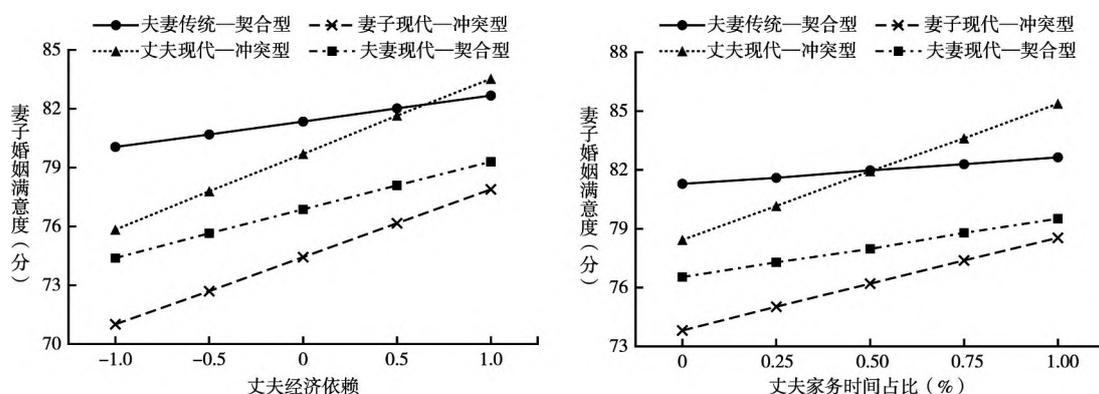


图4 分工实践与观念互动对妻子婚姻满意度的交互作用

2. 男性对妻子经济和家务贡献的重视程度随互动类型而变化

在夫妻性别观念互动的类型上,只有“丈夫现代—冲突型”的交互项具有显著性,男性对妻子经济和家务贡献的重视程度并未在参照组和其他两类互动间表现出差异。有学者指出,男性农民工在城乡迁移中会在家务分担和养家角色上做出让步,但这种让步更多源于对家庭现状的被迫妥协,男性自身仍需调和传统规范理念与现实分工实践之间的张力^{[34](pp99-119)}。然而,那些背离传统性别规范的男性如何解释和评价性别分工实践?本文希望对此予以解答并推进已有研究。

从妻子经济贡献的影响来看,“丈夫现代—冲突型”中男性最为重视妻子的经济能力($b = 2.25, p < 0.05$)。随着妻子从经济依赖者全然转变为经济供

养者,现代男性的婚姻满意度提高约5.1分,而参照组仅相应增加0.6分。当男性不再支持性别区隔的分工模式,而其妻子仍然期许他们担当经济顶梁柱时,现代男性反倒愈加重视妻子的经济贡献。有趣的是,传统女性同样更看重丈夫的经济贡献,这表明夫妻对彼此承担经济责任的要求存在一定冲突,从而验证了假设4的后半部分。

此外,还是在“丈夫现代—冲突型”中,打破传统规范的男性不甚在意妻子是否操持家务,对应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b = -4.25, p < 0.1$),图5中其预测线斜率甚至小于0。随着妻子成为完全的家庭照料者,现代男性的满意度反而降低了0.24分,但在都持有传统观念的夫妻中,传统男性的婚姻评价却相应提高了4.01分。可见,丈夫对妻子家务贡献的认可程度取决于丈夫是否提倡传统分工模式。

⑥分析结果留存备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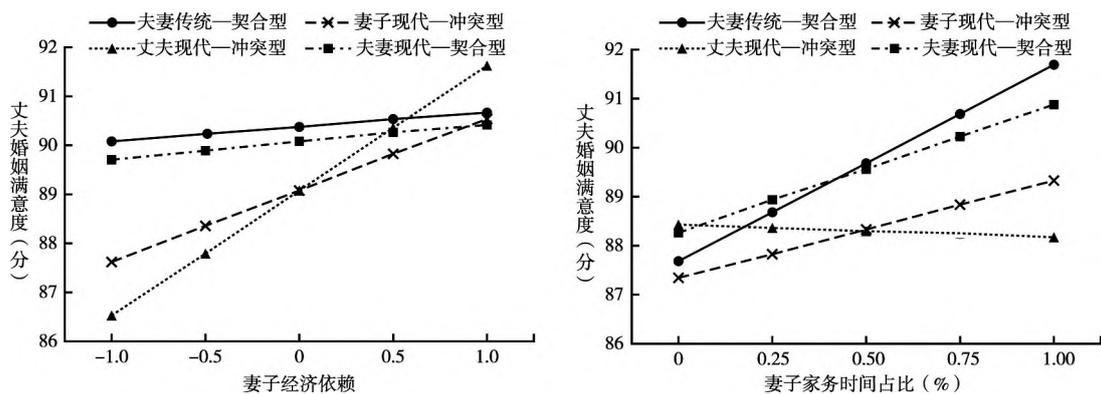


图5 分工实践与观念互动对丈夫婚姻满意度的交互作用

(四) 分工实践与观念互动:孰强孰弱?

1. 夫妻间性别观念的契合对婚姻满意度而言更为重要

图6展示了在表3和表4的模型4中分工实践与观念互动的相对作用。对妻子来说,只考虑显著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其绝对值由大往小依次为:妻子现代—冲突型($b = -0.13, p < 0.001$)、夫妻现代—契合型($b = -0.07, p < 0.001$)、丈夫经济依赖($b = 0.07, p < 0.001$)、丈夫家务时间占比($b = 0.05, p < 0.001$)。对丈夫来说,同样是两类冲突型的观念互动影响更强,其次是妻子经济依赖的影响($b = 0.04, p < 0.01$),再次是妻子家务时间占比的影响($b = 0.03, p <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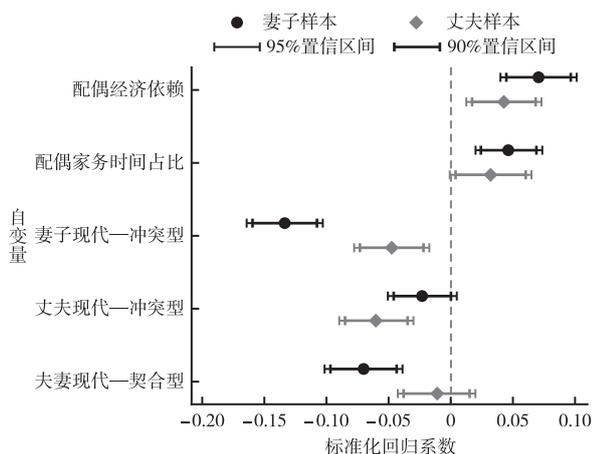


图6 分工实践和观念互动的相对作用

上述排序表明,对于婚姻满意度而言,相较于配偶的经济和家务贡献,更为重要的是夫妻间性别观

念契合。这一发现为现代婚姻意义的转变提供了经验证据,人们愈发重视精神层面的协调合拍与相互理解。不过,与家务贡献相比,配偶经济贡献对两性婚姻感受的作用更强,这再次印证了在前途莫测的市场化进程中,经济基础作为婚姻稳定剂的作用不容小觑。

2. 两种影响在不同婚姻队列和城乡地区间存在异质性

表5和表6为分婚姻队列和城乡地区的回归结果。城乡地区指家庭居住在城镇还是农村。婚姻队列指在特定时期内结婚的人口,按照中国社会的重要转型阶段,本文将结婚时期划分为1978年以前、1978-1991年、1992-2009年、2010年以后^⑦。分工实践与观念互动的影响在不同队列间存在明显差异。就女性样本而言,在观念互动上,“妻子现代—冲突型”显著降低了所有队列的婚姻评价,而“夫妻现代—契合型”的负面影响则只在1992年之后的队列中具备显著性。此外,分工实践的显著影响在1978年以后的队列中才显现,1978-1991年结婚的女性既重视丈夫的经济贡献也重视其家务贡献,而1992-2009年的女性队列仅看重丈夫的经济贡献($b = 2.23, p < 0.05$),2010年之后结婚的女性只关注家务分工($b = 4.85, p < 0.1$)。这说明,随着队列后移,女性对婚姻中经济资源的依赖逐渐减弱,对于新生代女性而言,夫妻观念契合和平等家务分工是打造满意婚姻的关键秘诀。

⑦之所以使用婚姻队列而非出生世代,是因为婚姻队列更能反映个体结婚时经历的社会变迁。

与女性不同的是,夫妻观念冲突只显著降低了1992年之前的男性队列的婚姻评价,且似无相关检验显示,两类冲突型观念互动的系数在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的队列模型中不存在组间差异。在1992-2009

年的队列中,男性不再受观念冲突的影响,而是更加强调妻子的经济贡献($b = 2.24, p < 0.01$)和家务贡献($b = 6.21, p < 0.01$)。对于2010年以后结婚的男性,分工实践与观念互动都没有对婚姻感受产生显著影响。

表5 妻子婚姻满意度的多元回归:分队列和城乡的估计(N=6052)

自变量	婚姻队列				居住地	
	1978年以前	1978-1991年	1992-2009年	2010年以后	城镇	农村
配偶经济依赖	2.320 (1.705)	3.872*** (1.046)	2.225* (0.996)	2.040 (1.336)	3.799*** (0.892)	1.716* (0.778)
配偶家务时间占比	-0.753 (2.739)	8.268*** (1.998)	0.947 (2.035)	4.852+ (2.884)	7.043*** (1.744)	1.233 (1.562)
夫妻性别观念互动 (夫妻传统—契合型=0)						
妻子现代—冲突型	-5.808** (2.097)	-7.217*** (1.341)	-6.133*** (1.334)	-6.468** (2.029)	-6.891*** (1.129)	-5.887*** (1.048)
丈夫现代—冲突型	-0.149 (1.539)	-1.082 (1.094)	-2.006 (1.255)	0.975 (2.105)	-0.882 (1.035)	-1.156 (0.916)
夫妻现代—契合型	-5.781 (3.575)	-2.971 (2.116)	-4.749** (1.546)	-4.517* (2.124)	-3.493** (1.288)	-4.918*** (1.407)
常数项	92.698*** (14.535)	82.020*** (5.240)	80.137*** (4.364)	78.805*** (6.353)	72.278*** (4.374)	77.654*** (4.283)
R ²	0.098	0.082	0.058	0.082	0.083	0.090
样本量	718	1872	2224	1238	3093	2959

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表示 $P < 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

表6 丈夫婚姻满意度的多元回归:分队列和城乡的估计(N=6052)

自变量	婚姻队列				居住地	
	1978年以前	1978-1991年	1992-2009年	2010年以后	城镇	农村
配偶经济依赖	0.089 (1.122)	1.320+ (0.773)	2.240** (0.781)	-0.300 (1.098)	1.690* (0.657)	0.820 (0.616)
配偶家务时间占比	3.108 (2.768)	-1.832 (1.860)	6.214** (1.931)	-0.069 (2.648)	2.155 (1.663)	1.883 (1.450)
夫妻性别观念互动 (夫妻传统—契合型=0)						
妻子现代—冲突型	-3.556* (1.634)	-2.341* (1.010)	-1.179 (0.984)	0.680 (1.647)	-0.431 (0.869)	-2.641*** (0.795)
丈夫现代—冲突型	-3.263* (1.445)	-3.029*** (0.884)	-1.220 (0.980)	-0.595 (1.824)	-1.001 (0.868)	-2.967*** (0.728)
夫妻现代—契合型	-3.972+ (2.257)	-2.171 (1.488)	-0.129 (1.181)	2.368 (1.718)	1.530 (0.994)	-2.418* (1.038)

续表

自变量	婚姻队列				居住地	
	1978 年以前	1978-1991 年	1992-2009 年	2010 年以后	城镇	农村
常数项	98.345*** (8.692)	94.094*** (4.077)	81.501*** (3.679)	88.422*** (5.433)	84.590*** (3.852)	87.846*** (3.310)
R ²	0.064	0.041	0.036	0.040	0.035	0.035
样本量	718	1872	2224	1238	3093	2959

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表示 $p < 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

此外,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也表现出城乡异质性,至此假设5完全得到证实。跨模型的系数比较显示,与农村女性相比,城镇女性的婚姻评价受丈夫经济贡献($\chi^2 = 3.13, p < 0.1$)和家务贡献($\chi^2 = 6.22, p < 0.05$)的影响都更强,观念互动的影响则不存在城乡差异。但在男性群体中,观念冲突仅显著削弱了农村男性的婚姻满意度,妻子经济贡献只会显著增进城镇男性的婚姻满意度。

五、总结与讨论

当市场化进程伴随现代化浪潮席卷而至时,中国婚姻家庭的变迁既呈现出现代化特征,也显露出传统模式的复苏,这种“变”与“常”浸润着个体对配偶养家和持家的角色要求。通过探究性别分工、性别观念与婚姻感受间的复杂关系,我们得以洞察私人生活在时代变革中的卷入路径。在社会性别文化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现存研究往往未充分观照情境分析与互动维度,忽视了夫妻之间多种模式的性别观念互动。鉴于此,本文使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引入夫妻性别观念互动的类型学分析,将分工实践与观念互动整合进情境视角下的分析框架,以期解开当代中国婚姻关系的满意度密码。主要研究发现可以概括为以下四方面。

第一,“男人养家,女人持家”的传统分工无法达成两性满意的婚姻。在挣钱养家之外,女性还看重丈夫分担家务,男性虽然要求妻子操持家务,但也重视妻子的经济能力。两性对配偶的要求彰显了跳出传统脚本的一面,尤其体现在男性对妻子供养家庭的要求当中。当市场竞争的旋涡裹挟着消费主义大行其道时,我们发现婚姻关系中经济贡献作为“硬通货”的地位愈发凸显,这一发现既为与西方学界的“弹性假说”对话提供了中国经验^{[3][28][29]},也为从中国

日新月异的变化中把握男性对经济分工的感受提供了实证探索。但是,妻子的家务贡献和丈夫的经济贡献依然显著地影响婚姻满意度,在个体对理想配偶角色的定义中,传统与现代元素共生共存。

第二,基于丈夫观念现代性与妻子观念现代性两个维度,本文归纳出四种夫妻性别观念互动的典型类型:“夫妻传统—契合型”“妻子现代—冲突型”“丈夫现代—冲突型”和“夫妻现代—契合型”。类型学分析展现了夫妻间多样化的协商一致和矛盾冲突,有助于更精细化地考察观念互动对婚姻感受的影响。性别观念冲突的类型不利于提升婚姻满意度,特别是当婚姻中一方支持性别平等、配偶笃信传统规范时,男女两性的婚姻满意度最低;但在都持有现代观念的夫妻中,妻子反而表现出了更低的满意度,这揭示出性别平等进程中蕴藏的不确定性。上述分析表明,在剖析夫妻互动情境下的情感体验时,不能囿于单方的个体认知或简单的契合与否,而需考虑夫妻观念互动的多种类型。

第三,在四种夫妻观念互动的类型中,个体对配偶挣钱和做家务的重视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孤立个体的主观定义无法完全解释婚姻感受,夫妻在互动过程中共同编织着意义之网,因而分工实践对婚姻感受的影响嵌入于由观念互动构成的夫妻互动情境之中。借助观念互动类型,我们得以描摹出不同夫妻在定义理想配偶角色时的“心理画像”。

相比于一致认同传统规范的夫妻,首先,在“妻子现代—冲突型”中,丈夫试图在事业上付出,而妻子期待在家庭中有获得感,这时女性更重视丈夫的家务贡献。其次,在“丈夫现代—冲突型”中,婚姻矛盾主要体现为“谁来养家”,如阿莉·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所说,双方在婚姻中的付出仿佛

是“寄错地址的信件”，得不到另一方的回复^{[22](P243)}。该类型的妻子尤为重视丈夫履行经济支柱的职责，而丈夫对妻子的要求则与传统男性气质有所偏离，他们更加在意妻子的经济而非家务贡献。有研究讨论了基于实用主义的男性气质“妥协”^{[34](P179)}，但这里的“偏离”更多源于价值观念的变化。最后，在“夫妻现代—契合型”中，妻子追求性别平等的婚姻生活，经济自主性更大幅度地提升了婚姻满意度，并且她们特别强调家务的平等分工。

第四，对于中国夫妻的婚姻满意度而言，性别观念契合比性别分工实践更为重要。随着婚姻家庭的变迁，与切尔林的婚姻三阶段理论的预期如出一辙^[1]，人们将亲密关系中的非物质需求提到了核心位置，“三观相合”成为满意婚姻扎根的文化土壤。但是，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呈现“时空压缩”特征^{[19](PP3-12)}，在不同的婚姻队列和城乡地区间，分工实践与观念互动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在婚姻队列层面，年轻女性更加注重观念契合与家务分工，折射出性别平等面相的现代期待。可是，随着队列后移，男性对观念契合的重视程度呈现出递减趋势，市场转型时期结婚的男性仅关注分工实践，对于近十年结婚的男性而言，其婚姻感受可能受到本文分析框架之外的其他因素影响。上述队列差异显示出鲜明的性别模式，新生代中男女婚姻需求的差异趋于扩大，体现了婚姻变迁在两性间的不均衡性。在城乡层面，与农村女性相比，城市女性更强调丈夫的经济和家务贡献，而城市男性只关注妻子的经济贡献，这种差异与城乡间悬殊的生活成本相对应。

细捋之前林林总总的证据会发现，个体对配偶

的角色要求深嵌于经济发展环境、社会性别文化和夫妻互动情境之中，表现出传统与现代元素混杂、经济与文化逻辑交织、个体与配偶观念交互的多面性。本文引入夫妻性别观念互动这一概念，在学理上为探讨由夫妻互动情境所形塑的婚姻感受提供了支撑，也在经验上对思考中国家庭内分工公平逻辑与情感生成机制的复杂性具有借鉴价值。但是夫妻互动过程是持续进行的，具有创造性和建构性，定量研究只能揭示相对模式化的关系，无法完整揭示夫妻对整个互动情境做出的意义阐释与主观解释^[60]。未来可以结合深入细致的定性方法，考察日常生活中夫妻在传统规范与现代期待间的遵从、协商与博弈，以及双方对性别分工实践的描述性言说，以触及更为细腻的心理过程。

婚姻满意度的“个体私事”事关人口战略的“国家公事”，在婚姻和生育高度捆绑的中国，本文对于推进新时代和谐婚姻家庭建设、主动应对“低生育率陷阱”具有政策含义。首先，男性的养家包袱和女性的家务重担都会带来婚姻危机，加速运转的现代社会需要男女共担家庭责任，社会各界应充分承认家务劳动价值、消解刻板性别分工模式，为事业型女性和家庭型男性营造开放包容的环境。其次，与追求性别分工在量化标准上的绝对平等相比，我们更应鼓励夫妻关注性别观念的冲突，探寻满足双方期待的分工实践，以建立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共同经营的婚姻关系。最后，婚姻问题的症结不在夫妻本身，政府需要健全家庭支持政策体系，建立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减轻家庭层面“一老一小”的照料负担，纾解男女两性在养家与持家上的角色冲突和实际压力。

[参考文献]

- [1] Cherlin, A.. The D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Marriage[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4, 66(4).
- [2] Bradbury, T., Fincham, F., and Beach, S.. Research on the Nature and Determinants of Marital Satisfaction: A Decade in Review[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0, 62(4).
- [3] Wilkie, J., Ferree, M., and Ratcliff, K.. Gender and Fairness: Marital Satisfaction in Two-Earner Couples[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1998, 60(3).
- [4] Braun, M., Lewin-Epstein, N., Stier, H., et al.. Perceived Equity in the Gendered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8, 70(5).

- [5]许琪. 挣钱还是做家务——丈夫的经济贡献和家务贡献对妻子婚姻满意度的影响[J]. 社会学评论,2022,(3).
- [6]计迎春. 社会转型情境下的中国本土家庭理论构建初探[J]. 妇女研究论丛,2019,(5).
- [7]England,P.. The Gender Revolution:Uneven and Stalled[J]. *Gender and Society*,2010,24(2).
- [8]孙晓冬. 收入如何影响中国夫妻的家务劳动分工?[J]. 社会,2018,(5).
- [9]Claffey,S.,and Mickelson,K..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and Distress:The Role of Perceived Fairness for Employed Mothers[J]. *Sex Roles*,2008,60(11).
- [10]刘爱玉、刘继伟. 市场化过程中就业脆弱性之演变(2000-2010)[J]. 河北学刊,2020,(1).
- [11]於嘉. 何以为家:第二次人口转变下中国人的婚姻与生育[J]. 妇女研究论丛,2022,(5).
- [12]杨华磊、王嘉昊、刘雅静. 性别分工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研究[J]. 西北人口,2023,(3).
- [13]Lavee,Y.,and Katz,R.. Divison of Labor,Perceived Fairness, and Marital Quality:The Effect of Gender Ideology[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2002,64(1).
- [14]计迎春、周海燕、林泽宇. 中国婚姻制度变迁的日常生活逻辑——基于上海市人民公园中产父母相亲角的田野观察和理论反思[J]. 妇女研究论丛,2023,(4).
- [15]李婷、郑叶昕、闫誉腾. 中国的婚姻和生育去制度化了吗? ——基于中国大学生婚育观调查的发现与讨论[J]. 妇女研究论丛,2022,(3).
- [16]毕文芬、初奇鸿. 夫妻地位匹配与女性婚姻满意度的关系变迁——家庭收入的调节效应[J]. 宁夏社会科学,2017,(6).
- [17]Becker,G..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 [18]Zuo,J.,and Bian,Y.. Gendered Resources, Division of Housework, and Perceived Fairness[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2001,63(4).
- [19]Chang,K.. *The Logic of Compressed Modernity*[M]. Cambridge:Polity Press,2022.
- [20]Lewis,J.. The Decline of the Male Breadwinner Model[J]. *Social Politics*,2001,8(2).
- [21]刘爱玉、佟新、付伟. 双薪家庭的家务性别分工:经济依赖、性别观念或情感表达[J]. 社会,2015,(2).
- [22][美]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著,肖索未、刘令堃、夏天译. 职场妈妈不下班:第二轮班与未完成的家庭革命[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 [23]牛建林. 转型期中国家庭的家务分工特征及其在生命周期中的变化[J]. 劳动经济研究,2020,(4).
- [24]Kluwer,E.,Heesink,J.,and Vliert,E.. Marital Conflict about 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and Paid Work[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1996,58(4).
- [25]Qian,Y.,and Sayer,L.. Division of Labor,Gender Ideology,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in East Asia[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2016,78(2).
- [26]Shek,D.. Gender Differences in Marital Quality and Well-Being in Chinese Married Adults[J]. *Sex Roles*,1995,32(11-12).
- [27]Kaplan,A.,and Stier,H.. Political Economy of Family Life:Couple's Earnings, Welfare Regime and Union Dissolution[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2016,61(5).
- [28]Oppenheimer,V.. Women's Employment and the Gain to Marriage:The Specialization and Trading Model[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97,(23).
- [29]Cooke,L.,and Gash,V.. Wives' Part-time Employment and Marital Stability in Great Britain,West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J]. *Sociology*,2010,44(6).
- [30]毕文芬、潘孝富. 男性客观择偶偏好与婚姻满意度的路径分析[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4).
- [31]胡文馨、曾湘泉. 美貌能提高婚姻满意度吗?[J]. 劳动经济研究,2019,(3).
- [32]Chen,Y.,and Hu,D.. Gender Norms and Marriage Satisfaction:Evidence from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2021,(68).
- [33]Ji,Y.. A Mosaic Temporality:New Dynamics of the Gender and Marriage System i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J]. *Temporalités*,2017,(26).
- [34]蔡玉萍、彭钢旒著,罗鸣、彭钢旒译. 男性妥协:中国的城乡迁移、家庭和性别[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 [35]Amato,P.,and Booth,A.. Changes in Gender Role Attitudes and Perceived Marital Quality[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5,

60(1).

- [36] Wilcox, W., and Nock, S.. What's Love Got to Do with It? Equality, Equity, Commitment and Women's Marital Quality[J]. *Social Forces*, 2006, 84(3).
- [37] Yoo, J.. Gender Role Ideology, Work-Family Conflict, Family-Work Conflict,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among Korean Dual-Earner Couples[J].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021, 43(4).
- [38] Taniguchi, H., and Kaufman, G.. Gender Role Attitudes, Troubles Talk,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in Japan[J].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014, 31(7).
- [39] 马琦峰、杜鹏. “历久弥新”还是“归于平淡”: 结婚时长、夫妻共识与中老年人婚姻满意度[J]. *西北人口*, 2024, (5).
- [40] 郑晓冬、方向明. 婚姻匹配模式与婚姻稳定性[J]. *人口与经济*, 2019, (3).
- [41] [美] 欧文·戈夫曼著, 冯钢译.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42] [美] 兰德尔·柯林斯著, 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 互动仪式链[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43] 王晴锋. 情境互动论: 戈夫曼社会学的理论范式[J]. *理论月刊*, 2019, (1).
- [44] Goffman, E.. *Frame Analysis*[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 [45] Perinbanayagam, R.. The 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Ethnomethodological and Dramaturgical View[J].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974, 15(4).
- [46] Minnotte, K., Minnotte, M., and Pedersen, D.. Marital Satisfaction among Dual-Earner Couples: Gender Ideologies and Family-to-Work Conflict[J]. *Family Relations*, 2013, 62(4).
- [47] Pimentel, E.. Gender Ideology, Household Behavior, and Backlash in Urban China[J].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006, 27(3).
- [48] Zvonkovic, A., Schmiede, C., and Hall, L.. Influence Strategies Used When Couples Make Work-Family Decisions and Their Importance for Marital Satisfaction[J]. *Family Relations*, 1994, 43(2).
- [49] 闫辰聿、和红. 回归传统还是向现代转变——年龄、时期和队列视角下中国人性别角色观念的变迁[J]. *兰州学刊*, 2022, (5).
- [50] 吴愈晓、王金水、王旭洋. 中国性别角色观念变迁(1990—2018): 年龄、时期和世代效应及性别差异模式[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22, (4).
- [51] 马磊. 偏好与结构——同质婚的形成机制研究[J]. *北京社会科学*, 2019, (8).
- [52] Kalmijn, M.. Inter-marriage and Homogamy: Causes, Patterns, Trends[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8, (24).
- [53] Song, J., and Lai, W.. Cohabitation and Gender Equality[J]. *China Review*, 2020, 20(2).
- [54] [美] 阎云翔著, 龚小夏译. 私人生活的变革: 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 [55] 李卫东. 流动模式与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研究: 基于性别和世代的视角[J]. *社会*, 2019, (6).
- [56] Brines, J.. Economic Dependency, Gender,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at Home[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4, 100(3).
- [57] 卿石松. 中国性别角色观念代际传递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 2018, (6).
- [58] 郭志刚. 社会统计分析方法[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 [59] Weesie, J.. Seemingly Unrelated Estimation and Cluster-Adjusted Sandwich Estimator[J]. *Stata Technical Bulletin*, 1999, (9).
- [60] Blumer, H.. Sociological Analysis and the “Variable”[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56, 21(6).

责任编辑: 绘山